

马 原

王志文

彭小莲

草 婴

冯骥才

卿光亚

赵本山

干露露



那些
说不出的

慌张

李宗陶·著

商
禧
印
書
館

李宗陶 | 著

那
些
说
不
出
的
慌
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 李宗陶著. -- 北京: 商务印
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0998-7

I. ①那… II. ①李… III. ①人物-访问记-中
国-现代 IV. ①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551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李宗陶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ISBN 978-7-100-10998-7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960×1300 1/32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5

定价: 49.00 元

目录

序	宗陶写人 - 陈丹青 001
自序	我总想进到心灵层面，在这个时代，会不会不礼貌 003
龙应台	台上 台下 008
林青霞	一代大青衣 034
朱新建	一笔一笔救自己 056
马 原	我只有一条命，我有些别的安排 088
王 蒙	通人王蒙 108
张汝伦	狂者的世界 148
牛 汉	现代文学史要重新写 172
草 婴	草婴的胜利 184
冯骥才	冯骥才的财富 200
贾平凹	让带灯说 224
王志文	生而演员 262
彭小莲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286
刘 恒	作家始终处在自我贬低中 306
卿光亚	“范跑跑” 的勇敢是因为他病了 320

赵本山 | 赵本山的江湖 332

周立波 | 玲珑周立波 368

干露露 | 中国制造 388

附记：为什么要写干露露？ 418

代后记 | 阅人有数：采访龙应台的故事 420

序

宗陶写人

陈丹青

我与宗陶仅及三两回面见，清俊而皎然，像个白骨精。我喜欢“李宗陶”这个名字，似有旧时的什么意思在。说来是巧，当年我母亲有位右派女同事常来我家絮叨，出声嘹亮，也同名，我叫声“宗陶阿姨”，就蹭在边上听。

这位李宗陶说话，细声细气。她该是“七〇后”吧，却也给我想起六十年代的上海人：小时候仰看文艺圈或出版社的阿姨之类，多有书生相。如今的记者或撰稿人另是一种集体面相了，不好形容，上海人堆里，早先的书生相也极罕见了。南周系统分在各地的记者，很不少，近日得识供职上海站，并是上海人的男书生王寅，接谈温雅，也如“文革”前的沪地书生，仿佛是我的哪位中学同学。

我尚未有过李宗陶当面采访的荣幸，但她在《南方人物周刊》的大稿件，都会从头到尾读：她写木心，写慈禧，写干露露，及近时所写的朱新建——写到一半，新建就死了——都是难得一见的好稿子。

三联、南周的若干记者（我至今不确定该称他们为记者抑或撰稿人），我都衷心佩服，因自己这些年也竟胡乱写作，深知写不同的人物而兼及故实，要能有料、有趣，又做到所谓“客观”，并介入适度而隐然的评议，其实很难。宗陶的稿子，篇篇引我读下去，以至慨然，尤使我惊异的是，她写的人物大抵互不相干，分殊判然，怎样做到呢？而每写一人，每成一稿，显然她就掉进去，手眼所及，之细腻，之会心，恨不得钻进那人的肚里，直如孙悟空。当然，这是除了可贵的体贴与好奇心，还须很认真。单是写朱新建，宗陶就拨了几个电话给我，说她不懂画家，

也不很了解“五〇后”的行状，因新建是我老友，她就來仔細問。

如此，她想必在新建那里，及她书写的每个人物的众多亲友处，都下了工夫。我有幸不做记者，轮到受托写哪个家伙，从不想到找人打探，这一层，便可见宗陶的职业德性了。

会写人，谅必敏感于人。奥运会那年，我携母亲自纽约返沪小住，有一日陪妈妈去静安区地段医院就诊，遇到宗陶，聊了几句——到今年年初，我有篇回想木心先生的纪念文出，开首略略写到前年逝世的母亲，宗陶读后，来短信，只说：“丹青，单写写你的母亲吧，想读。”那篇稿子的主角原是木心，而宗陶与我母亲仅数年前在医院路边见一面，不到十分钟，却能记得，我于是明白何以她写人会观察，会体贴，悄然存有女心。

而她七八年前专稿写木心，花了大功夫。其时，木心先生才在大陆出诗书，圈子内外是或漠然、或讽议，宗陶郑重其事，亲往乌镇与老先生做朋友。及2011年木心故去，她来短信，说，从网络发布的照片看，木心暮年穿着的那件条纹毛衣，便是她送给老人的。此事我并不知道，而宗陶见到，“流下泪来”。

她也好玩，那次采访后或与木心还有通信，先生老派人，信首称她“宗陶弟”，她着即给我来电话发急，声音高了，好纳闷：“我是女的呀，先生怎么称我‘弟’？”我大笑了，忘记怎样回应她，此刻想起鲁迅当年初识萧军萧红两口子，复信中为自己斟酌如何称萧红，写了一长串有趣的古称与旧称。怎样的旧称呢，此刻也忘记了，不晓得有没有个“弟”字。

我猜木心蛮喜欢李宗陶，现在宗陶要出书了，央我写几句，便是以上这些。书稿早经发来。我的业余性疏懒，是写起什么，不愿看文本，我心想：宗陶嘛，总归写得很好的，至于“书”，待出版后由她寄给我，自己捧着看。杂志的稿子汇成专书，以我的偏见，会更好看的。

2014年5月28日写在北京

我总想进到心灵层面， 在这个时代，会不会不礼貌

—

江南炎热，梅雨季像艘慢船，拖着人昏昏驶向盛夏。天空总是灰黄色的。

这部书稿同我一样，昏沉不宁，近乎忧郁。将近三年，它经历了三次“通不过”，总之，就是不顺。而我，却有心思写一个自序了。

先说最近的一次心有所动。在德国北部，礼节性拜访一个艺术园区的主席沃尔夫冈·戈漠先生，没有写作任务。他63岁，身高1.96米，本是画画的，也做雕塑，在军队服役12年，经历过柏林墙的倒掉。操盘北部艺术区之前，他是一家犹太人博物馆的馆长。那段时间里，他资助过一些流亡到德国的东欧作家和艺术家，还为君特·格拉斯办过一个素描展、一个水彩画展——用他的话说，格拉斯是一位有写作才华、爱思考的版画家。他轻声细语化解我提问中的锋芒，提供一种平和和大气的艺术批评，一边轻描淡写带出这些往事，谈话于是变得开阔起来。不知讲到哪里，他说：“60多年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不幸运吗？”我忽然眼睛红了。因为前几天在巴黎，听另一位白了头发、曾经波澜壮阔的长者讲出相同的话——他曾以soudruzstvi（捷克语：同志）的身份会见过哈维尔——这是时间给他们的礼物，也

是对生长在和平年代却难免焦虑虚妄的后生者们的提醒：“沉着些吧。”

二

1932年1月底，日本海军陆战队潜入上海，同驻沪第十九路军交战。消息传出，W.H. 奥登写下诗句：

啊，我听到，在我的周围，与上海涌出的

游击战那遥远彼岸的嘟哝声交织的

“人”的声音——“告诉我们在疯狂中存活下去的路吧！”

20岁的大江健三郎读到，心底震撼。因为诗人在批判现实政治的同时，关照了人的存在和灵魂——这是文字的职份，他以为。十多年后，大江健三郎写出了中篇小说《告诉我们在疯狂中存活下去的路》。

物理学有个概念叫做界面（interface），意思是异质的两个物体相衔接的区域。我想，每个人的内心与表象，灵魂与外部现实之间也有一个界面，它是一种隐匿的保护层。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身心分隔，拥有自己的秘密。记者、作家、画家、音乐家，应是尝试说出这些秘密的人。人物特稿的使命之一就是尝试开掘人物的内在世界，将被界面隔开的两部分打通，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因果和出离因果，将那些似乎被遗忘被切断的事物联结起来，将那些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语言行动纳入理解。每一次采访，光线、气息、节奏、契机都是微妙的，若是能触摸到那层界面，穿透它，甚至只是在上面游走，都是空山雪霁、云卷云舒时刻。

一个人的内心真实不是伸手就可以拿走的现成之物，它常常是被视而不见、藏在意识的褶皱里，或者已经悄悄流走却又意外重现的东西。

君特·格拉斯画过一幅水彩：他的打字机，漂亮的蓝。画上一节短诗：

我已用旧的打字机，

让我如何不停编织谎言，

即便如此，每当改稿之际，只是一个打印错误，
都将成为设法接近真实的证人。

在这里，你可以听见记忆中存着的痛苦往事在出声。2006年，格拉斯在自传中交待了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是纳粹武装党卫队队员的历史，将自己暴露在可能来自整个欧洲的批判平台上。无论一个人怎样掩饰、假装遗忘，心里总残存着一些真实记忆。撒谎和忏悔同时存在。有时候，它们会自我启动，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辅助，需要一盏照亮它们的灯。

这种时刻经常出现：言语繁盛，却无法抵达内心，无法在倾诉与倾听之中建立一种神思张悬。怪提问愚笨、耐心不济、录音笔僵硬吧，或者根本气场不对。

他的眉梢眼角，他的固执神态，他的叹气或沉默（沉默也是语言），偶尔露出的狡黠的笑，不假思索的语言惯性，精心为之的率性豪情；也许还有邈邈的衣衫，身上的烟味，掌上的茧子，以及某些节点上突如其来的走神……如何表现那些平静又迟钝的悲哀，那更像是意志力的乐观，那如影随形的孤独，还有他身后那个迷宫般的背景？世界好像旋转木马，感觉来来去去，交替、重叠、对峙，常常在不兼容的情况下同时涌来……人物特稿写作因此有了更复杂更辽阔的叙事空间，想象力、辨析力、平衡感、自我怀疑，都是质感所在，落到笔端，谨慎加精确，有时候，还需要一点点天马行空。

画家弗朗西斯·培根那些扭曲融化了人脸的三联画肖像一直吸引着我，引我看进去。用培根评价1926—1932年毕加索风格的话来类比：“一个从来无人探索的领域被打开了，那是一种有机的形式，和人的形象相连相系，却是一种全然的歪斜变形。”一张人脸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依然是他自己？一张脸在疾病、狂喜、仇恨里，依然可辨吗？“我”的边界在哪里？

人之存在是个谜。它被消解在人们对确定性的期待里，确定性让人安全，让生活容易，确定性对于谜一样的本质没有好奇心。所以，尽管有这么多历史的磨难，人们有了相对丰富的经验，下一回合却依然蠢笨，好像跟苦难初初相遇。

尼采的想法：在发生的那一刻，一个现象会显现出它的本质。但事情发生时，你多半不在那里，你只是一个不具有侦探资质的事后追踪者。怎样克服后见之明、

主人公过滤性的回忆以及时间性的失真？我觉得没有办法。怎样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的复杂”，“这个人也是”？只能在采访时为它们之外的可能性留出空间，在写作时避开这个行业里已经生成的某些腔调，比如高度仿真——具有上帝之眼，比如把人物的言行命运和年代紧紧捆绑在一起——人，纷纷沦为年份的注脚。

如果手艺不差，你的生命和情感会在他人的故事里得到延展，他人的经验也成为你的（终究隔了一层的间接经验）。然而确实，这种机会增多了：在探索对象的同时，我能感觉到重新认识了自己——都是有弱点有挣扎同时在不断自洽的人，以这具肉身，去追求高一点的东西——真是悲喜交加。

三

这里收录了17篇人物特稿，是我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作业，最远，大概是七年前写的。它们中的一些，被阅读，被肯定，大概因为其中朴素、诚挚、走心的东西。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够。已经形成套路了：精研一个人，从父祖、师承、教育、经历等等入手，从陌生混乱的片断材料中理出一根清晰理性的线索，主人公的种种包括心路通常被处理成一系列有因果关系的链条，读者也能消化。

可是承认吧，生活好像不是一条由原因、结果、挫败、成功连成的明亮轨迹——在这本集子中，不妨试试去捕捉这样的关节点（可惜没能再掘下去）。这种在因果之外、超越逻辑的东西，是迷宫，是不由分说，是人之为入而世界之为世界的诗性存在，如今就像培根那些三联画一样启示着我。它鼓动我去捕捉那些反理性的、锐利的、令人眩晕的时刻，那些刚张开了嘴下巴却不幸脱臼的时刻，那个类似卡夫卡笔下K的世界，那个反简化的世界……在通往人之深处的灌木丛生、风景奇妙的路上，这才刚刚开了个头。

然而环境变了。传统纸媒的衰落是上帝也束手无策的事情，同时，新媒体的内容正变得越来越轻——麦克卢汉说，媒介即内容——一种宏大沉着的美正在离我们而去。在这一轮失去重力的竞赛中，较为深入的写作变成一项需要坚持的事业，而探测个体的内在生活也变得更加不合时宜——它好像不在新时代的语法里。可心灵鸡汤仍有市场，还有治愈系——多么轻巧的词，还有大学里那些直逼内心

苦闷的讲座最容易让听众溢到走廊上……

文化是应对危机的古老而长效的技术。我打算这样写下去。越来越有把握的一点是：过一种审美的生活，是成为一个写作者的必要条件，是接近我想去的那个地方的必经之路。心无旁骛去听一场音乐会，看一次画展、一场芭蕾演出，或者在闷热的下午为自己配一壶茶，不是品味，不是沉溺，是在动荡岁月里提高综合技艺的一种修行，为写出更像样的东西。

2015年7月7日，上海



2012年10月于台北小巷。拍摄者：梁辰

龙应台 1952年2月生于台湾高雄。祖籍湖南省衡山县。作家、社会评论家。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及新竹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著有《野火集》《孩子你慢慢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亲爱的安德烈》《大江大海1949》等。

台上 台下

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蓝。下午，龙应台出现在台北火车站，背一个咸菜绿双肩背包。她穿得像一个大学生：白衬衣束进牛仔裤，白色运动鞋，短发被一顶咸菜绿灯芯绒帽压着。她跟随 80 位艺大的学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动，有点笨拙，但充满活力。

龙应台生于 1952 年。朋友们说，很少有人在这个年龄还能保有一团真气，一身热气。

许多镜头对着她。其中一台摄像机后面站着黑衣墨镜的大导演王童，他会将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拍摄成纪录片。

许多话筒伸向她。“我是身体很笨的人……”她一边用纸巾拭汗，一边微笑着解释这个名为“艺术席卷空间”的活动。

星期四晚上 10 点，她来彩排过。面对汗津津的舞蹈系学生，她用悦耳的声音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仅仅是练舞室里的舞蹈，还是空间的释放。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忙，心里积压了很多东西，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你们，被邀请一起跳舞，也许心里会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双双年轻的、干净的眼睛注视着她。

再早几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 14 楼的小办公室里开会，同下属敲定“释放”的每一个细节。白衬衣、黑马夹，最普通的短发样式。

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13 年前，龙应台从德国初回台湾地区，出任台北市首

任文化局长。有一天，她趑进一家设计感颇强的美发沙龙，小妹一声“局长我是你的读者啦”，听得她晕陶陶：台湾文化有希望。于是被设计，又烫又剪，弄成一个“戴安娜王妃头”。她掏出七百多元（新台币）结账，赫然发现看错一个零，这“王妃头”价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干净口袋，在发廊员工一字排开的“欢迎再来”里落荒而逃，回去就问同事“台北物价怎么这么高”，被告知挨宰，“王妃头”实在是“冤大头”。

处理公务时的龙应台表现得思路清晰，心细如发。她的指间夹一支笔，不时在空中点划，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请不要忘记”来起承转合，是高度灵敏的倾听者和反应者；她的想象力和控制力甚至延伸到现场在电视画面中的样子。

在她右侧的墙上，悬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 90 岁时的手泽：“取舍由时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会议室两面书架上，是台湾各区、县、镇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辞典》之类的台湾史，以及琦君、赖和、张我军、李乔、周梦蝶等上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有几层架上，是她的十几种著作，从《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钱买来赠送往来宾客的。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像一条不羁的龙。

空间释放的创意来自龙应台的欧洲经验。她从 Youtube 上找来几段放给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场，歌剧家扮演的卖菜人突然开唱，市场陡然生色；在丹麦的车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舞阵，肢体苏醒。龙的一位同仁也亲历过在纽约梅西百货买鞋，柜台旁冷不丁有人开唱音乐剧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龙应台对我说。这些观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养。

可彼岸的文化与此在的生活匹配吗？在这个女性都会拖着长音嗲嗲说“是一”、开计程车的男性习惯被称“先生”而非“师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么反应？机要秘书邓宗德告诉我，成人通常会害羞，若是一对小情侣，女的开跳，男的会跟随。两天里，我看到广场上不少用餐者举起手机录影；看到流浪汉光脚坐着，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滚圆的中年妇女被音乐和节拍领着，从身体到容颜都动了起来；也看到许多人，瞄一眼，匆匆而过。

就在几天前，车站广场大厅里拉起红线，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劳（外国劳工，台北有许多菲律宾、马来西亚籍务工者）进入。通常他们把这里当作台北的草坪，假日里三五席地而坐，说说闲话。我看到电视里有个女的愤愤不平：我们也不愿来这里“占用公共空间”，“有碍观瞻”，但休息天我们想出去的话，还能去哪里？这件事被视为侵害了外劳的人权，遭到舆论广泛批评。龙应台“敏感于人权”，与“交通部长”商议后，特别在议事会上强调邀请外劳参与“释放”。但不知什么缘故，头一场只见舞者，不见弱者。第二天，即使温和派报纸也表达了“一个车站，两种标准”的婉转批评，暗暗指向车站管理部门，这不是龙应台希望看到的。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本部门的上令下达，各个细密的齿轮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如何艰难咬合、负重运作，13年前她就有领教。如今，由局长而“部长”，意味着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

一

广场表演告一段落，龙应台去窗口买了开往高雄的高铁车票，往屏東老家去，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哥哥。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浩告诉我，你见到龙家人就会知道，什么叫作淳朴。

母亲应美君多次出现在她的著作里：浙江淳安人，杭州绸缎庄小姐，不顾家人反对下嫁湖南衡山人龙槐生，1949年随人潮涌向台湾，刚到高雄时，手里还抱着刚出生的龙应台的大哥龙应达。她用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租下一个小菜摊，卖西瓜、卖面粉、卖五金，卖自己包的粽子，卖一切难民需要的东西。她在有尿味的戏院里卖过票；编过渔网，半个月编好一张，换80元；她养过猪；她开口向邻居借钱，以便第二天交龙应台的学费……她像一株又柔又韧的水草，帮衬丈夫，带领四个孩子，在荒滩恶水中存活了下来。

童年时龙应台看美国电视，常常有感于母亲的“不优雅”：她讲话的声音是那么大，跟邻居讲到高兴时会笑得惊天动地，她开骂时也是正气凛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她的生命里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满豪气的东西。龙应台说，在有些方面，她像母亲。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条巷子里听见一位老妇的哀号，浙江口音的哀号，心有所动，“多管闲事”过问起来——写过《大江大海》，她知道这岛上每一位七八十岁的人，身上都藏着一部颠沛离散史。她在巷子里东问西问，得到的信息是，老妇人精神有问题。她拨通了市长郝龙斌的电话。市长出差，她又拨副市长的电话，副市长自国外派人调查。龙应台刚上火车，就收到回馈：社会局已派人上门了解情况，这位邓女士确实精神异常，已享受社会福利中心的照顾，他们会跟进，并“谢谢龙部长的通报”。龙应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我受不了”。

摄影师还捕捉到她在办公室里流泪的一刻，当时她面前摊着几封写于1937年前的遗书。写信的人，都在一个延续了20多年、被后人称为“白色恐怖”的时期被枪毙了。

龙应台有两兄两弟，长兄当年被逃难的母亲交给婆婆，留在大陆，1985年相认。在她心里，兄弟，不仅意味着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还意味着“在彼此的容颜里看见童年”。

从台北到屏东，就是在台湾岛的地图左侧自北向南划一条长长的曲线。一路向南，阳光愈发炽烈，空气愈发湿热，责任、公文、秘书、随护渐远，童年渐近。

童年，因为父亲是公务员，三年换个地方，一家人总在台南的乡村里迁徙，龙应台总是面对需要融入的新环境。跟多数军警公教人员的子女不同，她能交道，但不凑热闹；眼睛清澈，但看法独特；跟三个男孩一起长大，别有一种帅气豪情。

列车到高雄。龙应台背着她的双肩背小包，脊背挺直地在人群中行走。这背影，深深印在好友林青霞的记忆里。林告诉我，她第一次见龙应台大约是2003年，香港，在徐克和施南生家。（以下为林青霞口述）

那天，南生介绍说，她当过台北市文化局长。她长得娇小，声音非常悦耳，我们聊得很愉快。晚饭后她急着要走，因为小儿子飞飞在家。我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人，背一个很细的包包，脊背挺得笔直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就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想了解她。朋友与否，往往是一种直觉。

后来我们走近，常听她跟母亲、跟儿子通电话，很不寻常。她的母